

• 王雲五主編 •



報人·報史·報學

朱傳譽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朱傳譽著

報人·報史·報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目 錄

吳稚暉與「新世紀」	一
吳稚暉與袁可桴	六
朱洪和「北京日報」	一二
辦循環日報的老報人王韜	一六
報界奇人陳景韓	二〇
梁任公與新聞事業	二八
臺灣革命報人林呈祿	四二
兼介他所辦的革命報刊	
我們亟需「中國新聞史」	六九
關於「時務報」	八三
記「述報」	九五
中國早期的畫報	一〇六
談兒童報	一一三
最早的通訊社	一一九

追——從一個小考證說起·····

「傳播」與「宣傳」·····

雜誌與雜誌教育·····

校警研究·····

報紙版面研究·····

論改寫制度·····

採訪第一課·····

談辦兒童刊物·····

中國新聞事業研究導論·····

「中國新聞史」評介·····

「世界新聞史」評介·····

「雜誌世界」·····

「紐約時報」的故事·····

「這就是戰爭」·····

「普利遮獎漫畫集」·····

跋·····

一二三
一二八
一三二
一五二
一七九
一九六
二一三
二二一
二二八
二八〇
二八四
二九二
三〇〇
三〇六
三一二
三一七

吳稚暉與「新世紀」

吳稚暉先生是黨國元老，他用文字鼓吹革命，曾經在海內外發生深遠的影響；他是國語運動的導師，致力於國語運動，前後歷五十多年；他從不以作家自居，但是他所作的「咄齋客座談話」，跟「茶客日記」，充滿小品文情趣；他用以鼓吹科學，宣傳國語的文章，也都富有文學趣味。已故的胡適之先生，推崇他為近代的四大思想家之一，把他和顧亭林、顏習齋、戴東原相提並論，因此去年聯合國文教組織，選他為百年來哲學界的偉人，今年準備舉行紀念他的活動。

早期的革命志士，以文字為鼓吹革命的工具，因此都和報紙、雜誌發生關係，就稚暉先生和新聞事業的淵源來說，我們也可以說他是一位報人。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他在國學社任教員，鼓吹新教育，高談革命，革命言論都是在蘇報上發表。第二年（一九〇三），由於言論太激烈，蘇報被查封，他逃港赴英。

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巴黎跟李石曾、張靜江創辦「新世紀」週刊。到民國初年，他又參加革命報紙「中華新報」工作，他的「咄齋客座談話」，就是在該報所發表的散文，後來集印成書的。

其後，他雖然給不少報紙、雜誌寫過文章，但並沒有參加實際的新聞工作。他從事新聞事業

最長的一段時期，還是他在「新世紀」的時代

「新世紀」的經濟支持人是張靜江，由稚暉先生主編。他的筆名是「燃」或「燃料」，在五十三期（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一篇文章裏，他提到他們辦「新世紀」的動機，說：「故本報之發行於歐洲也，其大宗旨雖別有在，而小小之感情，因聞有探南極回者，言彼等探險隊之出發員，共二百三十許人，行至緯度八十一，即棄舟成居留地於冰上，希久居，徐徐進行。居留地之組織，一切皆備。携有印機一具，每半月出報一紙，以二百餘人所見之狀況，及所得之計劃，一一記入，以爲二百餘人交通之機關，復即憑之爲報告內國之記載。同人聞之，乃大動於中，故必欲使華字西渡，覺倍大歐洲，印刷料之取材，便於冰極者億萬倍，如許文明居留之學者，其數亦倍於探險投荒之隊員，不携得印刷器一具，人之度量相越，未免太懸殊，因而竭蹶以爲之倡，甚望後來居上者有人。」

他的所謂「大宗旨」，在第一期的發刊詞裏，寫得很清楚，其一、二兩條是：『（一）本報議論，皆憑公理與良心發揮，冀爲一種刻刻進化，日日更新之革命報。（二）本報純以世界爲主義。同人之意，以爲苟能發願與世界種種之不平等者爲抵抗，一切自包其中。不必支支節節，對於一方隅一事類而言。故雖局於情勢，限於聞見，止用一種之文字爲記載，或對一隅之事爲糾纏，皆不得已，非敢自畫。』

這時候，稚暉先生已跟 國父來往，參加了同盟會，但因爲三民主義還沒有受到普遍的認識

，社會主義思潮正氾濫各地，稚暉先生和張、李等在歐深受影響，遂在「新世紀」宣傳無政府主義，張靜江先生大談公妻制度，李石曾譯介克魯泡特金學說（李氏當時筆名為「眞」），稚暉先生倡萬國語。「新世紀」有幾個重要的專欄，如專刊各地革命消息的「萬國革命之風潮」；專刊雜文、隨筆的「鱗鱗爪爪」和「傷心見聞錄」；內容大都以滿清暴政爲攻擊的對象，鼓勵暗殺，主張推翻滿清，言論激烈，沒有一點妥協的餘地。凡是抱這主張的，都是同志，否則就是敵人。因此，他們對保皇黨及其機關刊物（如中外日報、時報等）攻擊得很厲害，于右老在當時所辦的幾個報紙如神州日報、民呼、民吁，排滿言論算是够激烈的了，但是有時仍不免受到「新世紀」的批評，被認爲太保守，不敢講話。

「新世紀」第一年共出了五十二期，每期兩頁，四面，分四欄編輯，加欄線，第一面有一個橫報頭，約佔版面八分之一。每星期發行一次，報價連郵資共十生丁。從第二年，也就是說從第五十三期起，篇幅增加到八頁，內容增加了約五分之一，「爲了便于裝釘及留存，且便於廣輸內地」，第二年起「改單張爲書冊之式」，封面也改成了全頁圖畫，不排正文。報資則增加到十二生丁。此後，除了從第八十一期起換了封面圖以外，到停刊止，一直沒有什麼更動。

「新世紀」雖然公開發售，但售報之例，則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爲號召，報費「照價繳費可也，隨便輸助巨款亦可也，不使取資，代派處廣爲寄送亦可也。」目的在使這份革命刊物能廣爲流布。

這一時期，正是中國輿論界的黑暗期，清政府對報刊威脅利誘，極盡摧殘之能事，革命報紙、雜誌或托庇於租界，或發行於海外；但清廷仍續運用外交關係橫加迫害，如最具影響勢力的革命刊物「民報」，在東京被迫停刊，即屬例證之一。「新世紀」出版後，分送留學生，有的竟不敢看，原件退回。因言論太激烈，立刻受到清廷的注意，除禁止入口以外，並且命清駐法使臣劉式訓向法國政府交涉，要求法國把「新世紀」封閉。劉氏交涉多次，均遭拒絕。稚暉先生在他寫的一篇「真不拿人當人」雜文裏，曾經引用了幾條當時國內報紙所刊關於清廷迫害「新世紀」的消息，其中有一條是中外日報的電文，原電是：「本館北京專電，七月十五日三點四十五分鐘發，六點十分鐘到。駐法劉星使電告政府，略言新世紀報，係孫文黨羽所開設。法係言論自由之國，是以無法阻止。」

「新世紀」出到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止，共出了一百二十一期，因為賠累太多而停刊。這份雜誌上的精彩文章不少，但是今天我們看來，仍以他的文章最出色。他是前清舉人，國學基礎自然很好，但是他不用當時一般知識份子所崇尚的桐城古文寫作，而自創了一種冷嘲熱罵，雅俗共賞的通俗文體。他說他這樣做，是爲了看報的人容易看完。在當時他能注意到報紙文字的可讀性，算是很難得的了。他的文章雖然嬉笑怒罵，但却有血有肉，有光有熱；因此有人把他的文章跟梁啟超的文章相提並論。可惜，他的這種看來粗俗，實際上天才橫溢的文章，不易倣效，因而後繼無人。

「新世紀」被譽爲「民報」的姐妹刊物，可見其在革命文獻中的地位是多麼重要。但張於英氏所編的「辛亥革命書徵」，收錄宣傳革命雜誌三十六種，獨缺「新世紀」。不知道是他當時沒有見到、想到，或是因爲它同時是宣揚無政府主義的刊物而沒有著錄？稚老藏有三年全份的「新世紀」，曾應國史館和史料機關、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的徵求，交由「世界」出版社重印，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在上海發行。黨史會和省立圖書館等機構，都藏有重印本。有關機構正趕編稚老全集，紀念他百年壽辰，也許能在其中找到不少他的文章和有關他的資料。

（五十二年三月八日中央副刊）

吳稚暉與裘可桴

光緒二十一年，稚暉先生在他的故鄉無錫（稚老原籍常州陽湖縣，因在無錫長大，視無錫爲其第二故鄉）研究「豆芽字母」的時候，他的同鄉學者裘可桴先生，也在熱心的提倡國語。稚老稱可桴先生爲前輩中之先知先覺，推爲現代之文中子，譽其文可媲美禮運大同章（見可桴文存稚暉序）；但是今天，我們只知道吳稚暉，知道裘可桴的人却很少很少。

可桴先生原名廷梁，字葆良。他比稚老八大歲，光緒十八年會中鄉試，其後兩試不第，遂絕意進取，轉致力於西學。他認爲「非行西政，必不能活吾民」，說中國教育的不能普及，是因爲學究教法不善，和中國文義太深。他以日本爲例：「日本詩詞歌賦之類，喜用漢文，譯報純用和文，泰西農工商礦諸學之書，日本譯印略備。其書愈切於民用者，和文愈多，漢文愈少，務令易曉而已。是以變法不數載，民智大開，未始非和文盛行之效。」（見「無錫白話報」序）

因此，他主張文字改革。不過，他的改革辦法，是「設法淺之」，而不是另創新字。他說：「比歲中國士人頗多創造新字，意非不善，然非假以國力，未易通行。」他指的所謂「中國士人」，自然是盧贛章、勞乃宣、王照這一班人。稚暉先生創「豆芽字母」就可能跟他們商量過。他的所謂「設法淺之」，就是改文言爲白話。這時候，正當甲午戰爭之後，朝野深受刺激，

都熱衷於變革。一般進步的知識份子，都以開啓民智爲己任。當時開啓民智的兩把鑰匙，是廣興學校和辦報。裘氏自然也受到影響。不過，他比一般知識份子更開通的是，他想把白話運動和辦報結合在一起。因此他說：「欲民智大啓，必自廣興學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日報始，報安能人人而閱之，必自白話報始。」

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他曾經去上海，建議汪康年辦一張白話報。這時候，汪正忙着辦時務報，沒有採納他的建議。不久，他又回到無錫。年底左右，他教他的姪女梅侶（按：裘梅侶名毓芳，戈公振謂其創辦「無錫白話報」而不及可桴，有誤。）把「格致啓蒙」譯成白話；教他的姪孫劉岑以白話譯「地球發民關係」；各方反應不錯，加強了他辦白話報的信心，就跟他的幾個朋友顧植，吳蔭階、丁梅軒等着手籌備。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一日，「無錫白話報」創刊號問世，發刊辭是裘氏寫的，其中有一段是：「報分三大類：一演古，曰經曰史，取其足以扶翼孔教者，取其與西事相發明者。二演今，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譯已刻者。取泰西小說之有裨理者。三演報，取中外近事，取西政西藝，取外人論說之足以藥石我者。談新述古，務擷其精，間涉談諧，以博其趣。每報一紙，不必子目悉備，取滿幅而止。惟末附貨殖必逐日登載。間述市面情形，以便民用。酒談茗話，亦偶載焉。汰蕪穢存精英，以話代文，俾商者農者工業，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購報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爲廣開民智之助。」

由此我們可以略知該報的編輯旨趣和內容大要。該報最初是五日刊，木刻活字毛邊紙印刷，每期一冊，每冊十餘頁。後來，裘氏怕人家誤會該報是用無錫方音編寫的，就從第五期起，改名爲「中國官音白話報」，每半月出一次，這張報的編者、作者，都是裘氏的子弟兵。後來，他們死的死，散的散，報也就跟着停了。

這張報的歷史雖短，但是它影響不小，其後如杭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揚子江白話報、京話報等相繼創刊，雖沒有達到他一縣一報的期望，却也風行一時。

辦報的計劃實現了，他開始致力於教育。他曾經辦東林學堂，請稚老、俞仲還、秦晉華等名士去當講師，融中西於一堂，無錫風氣爲之大開。

清末有很多進步的學者，雖已認識到白話可作爲普及教育的利器，但對這一工具，仍存鄙視態度，認爲不能用白話著書、立說或者產生文學作品。因此儘管他們提倡白話，使用白話，自己寫較正式的文章，仍舊用文言。可桴先生却不是這種人，他寫「廣告文」，簡述新聞文字的源流；說中國古代的學者是用當時的語言寫書。爲了提倡白話，他曾經跟他的好友鄧似周（與裘氏同爲梁溪七子，餘五人爲華若汀、秦潛叔、秦湘丞、楊範甫、楊仁，均負盛名）舌戰很久，可以說是最早的文白之爭。後來他又跟錢基博爲這問題筆戰經年。胡適之提倡白話文學，他覺得胡氏的見解更高，不以前輩自居，退而爲胡氏搖旗吶喊。

跟稚老一樣，他也一生提倡科學。他的大兒子昌運，是留美學農的，他的姪孫維裕（名次豐

），是上海交大物理學院的院長。他曾經在白話報上介紹華若汀的數學，怪曾國藩勸自己的兒子學數學，不勸全國。他寫信給嚴幾道，痛斥當時所流行的「中體西用」之說，著「國粹論」，斥章太炎、劉申叔輩所倡導的「國粹」是「俗學」，無補於國事；說中國古人所致力的人格致之學，才是真正的國粹。這篇文章，當時各報競相轉載，曾經轟動一時。

可桴先生對政治沒有興趣，曾作「勸仕」詩（原詩末段爲「愧乏從政才，謝君意殷勤，我非傲世士，鄙視登青雲，亦未慕高隱，欲問桃花津，願隨遁鐸，鼓吹終吾身，仕宦人所尊，翎頂紛磷彬，何須更增我，官已多於民」）以明志。辛亥革命，無錫人起而響應，公推他主持縣政。他勉強維持了幾天，就請俞仲還代理，自己跑到上海去，改名可桴，不再過問時事。戊戌政變前，他曾經寫信勸梁任公「爲國求益」，去西方深造；北伐以後，他又勸梁氏做學問家、教育家、演說家，展其所長，永遠不入政界，做一個新時代的木鐸。前者任公心動而未果，後者任公回信說「所規正得我心」，但不久就賚志而歿。

楊範甫勸可桴先生東游，可惜他沒有接受（其悼吳松雲詩有「君初受新法。依舊擁皋比，我作國音報，甘爲文士嗤，東游負良友，西益吐微辭，因愛故鄉好，伴君永不離」之句，可見其戀鄉太深。）。否則他如接近在日本的革命志士，說不定會創造出一番革命的偉業。

可桴先生跟稚老的友誼一直很好。稚老流亡海外時，他曾賦詩（原詩爲「大地桑成海，流年屋瀉飯，生逢亂離世，望斷短長亭，野戍悲猿鶴，淒風帶血腥，飛軍震山嶽，一擲百雷霆」）示

念。無縣各界公推他主修縣志，他力辭，薦稚老以自代，辭函中有「惟吳君稚暉，器識宏遠，爲全國有數人物，其才力十百倍於鄙人」之語，可見他對稚老的推重。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重慶六個公私學術機構，共同籌備刊行「吳稚暉先生八十壽紀念論文集」的時候，可桴先生以八七高齡病歿於上海。

他跟稚老是同鄉、同志、同際遇。他們都是舊時代裏的新人物，都因科場受挫，受甲午戰爭的刺激，憤而致力於西學。他們的國學基礎都很深厚，但都畢生倡導國語，致力於文字的改革；也都以在野之身來鼓吹新政。他們作過記者，獻身教育，是理論家，也是實行者。稚老一生討厭做壽，因此教育部才以出文集，舉辦「國語運動週來」給他祝壽，可桴先生七十歲時，把家人親友給他做壽的筵席錢，捐給慈善機構，倡「一生不做壽，死不開弔」，使滬、錫的社會風氣爲之一變。

兩個人所不同的是稚老亡命海外，奔走各地，宣揚革命，盡瘁黨國，成爲天下士；可桴先生服務鄉梓，足不離滬，僅被推爲一鄉之泰山北斗！

不過，我們不能因此而輕視可桴先生，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稚老雖顛沛流離，但舉家長住倫敦，尚能償其全家留學的素願；可桴先生却連遭喪子（長子昌運及任外交官的次子汾齡均先後夭折）失女之痛。他曾經把報國的宏願寄託在子女身上，沒想到子女會先他而歿，讀其「憫農辭」（悼其亡子），使人淚下。他晚年時，至友均先後謝世，讀其悼亡詩，可知他心情的沉重、落

冥！

稚老功在黨國，名垂不朽，無所置議；可桴先生爲國語運動和新聞事業的前驅，却名不見史傳，未免太委屈了一點。特略記其生平，以供修報史和國語史的人參考。

（五十二年十二月三日中央副刊）